

【学科发展】

论国家安全学的政治学基础

江天雨

【摘要】厘清交叉学科的学科属性是其建设发展的前提,作为新兴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需要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但由于国家安全所涉领域的广泛性、学科交叉的复杂性,关涉学科定位的理论研究依然缺位。政治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统合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进行交叉学科建设的锚点,国家安全学具有政治学门类属性。作为国家安全学指导思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具有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性”和“政治性”;而国家安全的实质可以由国家权力学原理给出整体性的解释。同时,总结国内外经验,国家安全学的设立基于政治实践和政治学学科议程发展的双重推动,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下议程更新的必然结果。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政治学均能提供国家安全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范式。国家安全学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政治学学科建制的融通性、研究议程的真实性,有助于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政治学理论;国家权力;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江天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京),2024.2.243~25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研究”(23CZZ00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一门学科的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科属性的准确定位,以及所属学科研究范式的有效性,这对于交叉学科而言可谓尤为重要。弄清楚作为交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的根本属性,有助于厘清学科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国家安全学是一个源于重大实践问题并直接指向现实政治实践的学术学科,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就当代中国而言,安全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①,国家安全从最初的政策问题演化为执政思想,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问题域”的国家安全领域已有20个^②。

可以说,“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每个领域都会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而各个领域视野下的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倘

若各自为政、缺乏统领,“国家安全”就会陷于外延不断扩张、内涵笼统失焦的虚化泛化。因此,国家安全研究需要上升到学科层面,以学科建设来聚焦和统合这个“问题域”。国家安全学是跨界交叉的典型代表,是一个广泛涵盖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历史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集合”,所涉及的不同学科跨门类、跨体系、跨领域、跨思维模式^③,方法论或研究范式具有明显差异。如果没有统一的理论基础,那么国家安全学很有可能只是一个“松散的学科”。这一涉及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已引起学界专家的普遍关注和讨论^④。

如何使这一新兴的学科“集合”体现出应有的“交叉性”而非“松散性”,需要明确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进行学科统合和议题聚焦,创立具有鲜明特点的学科基础体系,使之真正进入超越“问题域”的学

科层面。这意味着,作为一级交叉学科的国家安全学,亟待发掘出使其统合为一个整体(即一体化的国家安全研究体系)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学者已经指出,虽然国家安全问题涉及的领域很多,但只有这些领域中的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才属于国家安全学的范畴^⑤。据此作进一步思考,本文认为,对于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的学术研究,政治学当仁不让,政治学理论尤其国家理论是国家安全学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政治学之于国家安全学的基础性,看似是一个常识,但并非学界的共识,因此有必要厘清政治学为何以及如何提供了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基础。事实上,国家安全的“问题域”原本就是从政治实践中延伸出来的^⑥,这就为以政治学的学科属性来统合国家安全学的交叉属性提供了可能。

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本身即体现了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揭示的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和国家安全学的交叉性,都体现了政治学属性和政治学原理,从而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学科依归和学科规范。而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国家安全研究能够从“问题域”上升为学科,政治学学者的努力不可或缺。因此,国家安全学建设可以从政治学出发,以政治学的“国家性”统合国家安全学的“交叉性”,由政治学提供国家安全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基本范式;国家安全学也能反哺促进政治学的发展,使得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指向更加明确。

二、国家安全学的政治学属性

(一) 国家安全“总体性”的“政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要之处在于“总体”二字。^⑦对于国家安全“总体性”的内涵,学术界已有专门探讨^⑧,权威部门也有政策性表述^⑨。从实践层面看,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表现为国家安全意涵上的一体性、管理上的统筹性以及领导体制上的集中统一性,而从理论层面看,国家安全“总体性”则体现了

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性”和“政治性”。

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学科建构的起点。在国家安全各领域中,所有问题域都有强烈的国家性,都服务于现代国家建设。这决定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无疑是指向国家的。作为政治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和分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主要围绕国家起源、国家类型、国家演进、国家属性等问题展开探讨,研究的核心主体是国家,而国家安全学理论围绕与国家相关的一系列安全问题进行探索,其核心主体也是国家^⑩,国家理论作为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基础是毋庸置疑的,国家安全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起点应从国家理论开始。

认识国家、研究国家首先要理解政治,正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中所言,“国家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⑪。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只有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专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政治学的核心对象是国家,核心命题是“构建什么国家,如何构建和治理国家”^⑫。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安全学应属于“大政治学门类”。在“国家”这一核心概念之外,其他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的概念如“主权”“利益”等也是由政治学逐步确立的。

政治学的意涵是全方位的,体现了总体性的政治认知和统筹性的思维方式,同时,治国理政的组织方式也具有不同程度的集中统一性。自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就是一个多层面、多领域的问题,是整体性的体现。“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⑬“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⑭,城邦共同体(即国家)是政治最完善的程度,是完整形态,其他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城邦具体的政治实践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政治学研究才会涉及国家的所有方面,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只是研究“城

邦”、国家的某一个方面。因此,除了政治学,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准确、全面地诠释国家安全“总体性”的内涵。从共同体内部来看,任何一个单独领域的安全都必须服务和指向于整体性的国家安全,只有嵌入共同体建设的统一命题之下才有其意义和位置。从共同体外部来看,“总体”也意味着多个领域的内外联动,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整体的而非割裂的,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是共同的而非孤立的,这从根本上涉及如何从大历史观、大政治观的视角看待国际格局的变迁。从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出发,我国的国家安全学应逐步从西方主流国家侧重“外部威胁”的国际安全理论中转向,强调内外并重的国家安全;其学科建设发展的立足点是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问题,即中国需要拥有强大的国力,但并不因此而追求实力政治^⑤。

国家安全“总体性”所蕴含的国家性和政治性决定了,各种领域性安全及多种安全关系都具有政治性影响,都事关政治安全。由此,可以找到国家安全学统合多问题领域(见图1)、处理多学科关系的“钥匙”——如何判定具体问题是否应突破各自学科领域而进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从而在国家安全学视域下进行研究?关键是“是否会产生政治性的威胁或损害”。除了军事安全、政权安全等显性的传统安全之外,对于非传统安全而言,只有当一个问题在特定情况下已经或者可能会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时,这一问题才得以突破本领域的专业边界而进入“国家安全”的交叉领地,由此成为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议题。这为纷繁复杂的多元领域议题如何整合到国家安全研究的范畴内提供了判断依据。例如,在中美全面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科技、贸易争端问题就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科技安全、经济安全问题;而具有相似表象的美欧贸易争端则更多属于经济竞争的层面,没有被双方置于国家安

全的范畴。再例如,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必须从政治上看,如此才能够深刻认识到保障粮食自给自足的主动权是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从而衍生出粮食安全问题。

可以说,各领域中的专业问题是各自领域的原生风险,属于“发展”问题;只有突破了“政治性”的临界值之后,“发展”问题才会进入整体性的“国家安全”的领地。因此,“政治性”才是国家安全学应该并能够统合各具体学科领域问题的线索,必须把体现政治属性和战略属性作为实现不同学科视角交叉融合的锚点,如此才能坚持以国家安全学而不是其他学科的具体问题为研究方向。如果不能体现政治属性和战略属性,那么从军事学角度研究国家安全可能还会是单纯的军事观点,从管理学角度研究也很难超越应急管理的思路,这种研究无法体现学科交叉融合,也就不能推动国家安全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⑥。而政治学则为从学理层面研判政治性提供了依据,判断和衡量这些领域性问题是否触发了关乎政治安全的某些核心议题与概念,从而进入“交叉视域”中,比如经济发展问题可能触及绩效性合法性的讨论,社会治理问题可能导向对制度效能问题的质疑,等等。这为防止国家安全学过载、厘清学科边界、促进交叉学科融合提供了有效支持。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家权力原理

从理论逻辑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核心要素和“四梁八柱”^⑦,还要求国家安全学构建系统化、层次性的理论,来解释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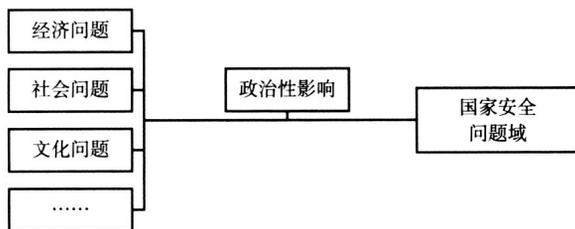


图1 国家安全“问题域”的生成机制

析总体性的国家安全。从作为政治思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具体的领域安全,经典地体现了国家安全的总体性和国家安全学的交叉性,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其学科目录是一级交叉学科(学科编号:1402)的依据所在。而在国家安全的多个要素、多个领域、多对关系当中,包含着在具体情境下不同目标可能相互矛盾的现象,这要求国家安全学既能够分门别类地研究具体的安全问题,又能够以整合性的“大理论”将各个领域、各个议题都整合到完整的框架中,在理论中理顺它们的相互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政治学理论则具有显著的整合性特征,能够将不同的问题整合为一体^⑧,有助于国家安全学形成从元理论、规范理论到应用理论的多层次的整体性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是有价值取向、目标导向的,即实现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要求,既需要研究国家安全领域性的实际问题,又需要构建底层价值和理念。安全不但是国家的重要价值,而且是国家的逻辑起点,这不仅要求国家能够建立起安全的制度,用以消除冲突、构建秩序,而且意味着为了保障安全,必须由权力来创建和维护秩序。这种权力创建的秩序还需要与正义相结合,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才能真正满足安全的需求,因此权力必须转化为权威,权威是穿上正当性外衣的权力^⑨。简言之,国家安全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安全。而总体国家安全观关于各领域性安全内在逻辑关系的论述,深刻地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内在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系统性关联。对此,国家权力的相关理论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整体性分析框架。

首先,人民作为现代国家权力的终极授权者,“人民安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体现了国家目的之实现程度。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国家要存在下去,首先必须保证安全和秩序,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并满足基本的正义。在现代国家理论中,

国家安全是维护人民安全的基础,维护人民安全是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来源。将“人民安全”置于国家目的论的语境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民安全依赖于国家目的的实现程度;进而,国家目的之实现程度,又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这样,在国家权力学脉络上,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人民安全—国家目的—国家权力”的内在逻辑和政治机理,必须按照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国家安全,而不能把三者割裂或者对立起来,其中包含了国家目的的正义性——国家安全并不仅仅是从主权国家的层面上,还是从兼具个体意义与集体意义的人民安全的角度出发,去应对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面临的新风险、新挑战。

其次,国家权力学提供了分析、理解国家安全的底层逻辑。在既有国家权力理论的基础上,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理论具有启发性,他将国家权力看作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互动的结果^⑩。国家权力的安全即国家权力的获得与巩固,离不开每种权力的实现以及相互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过来,作为“结果性权力”的国家权力又成为各种权力赖以存续的制度化平台,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国家命运。

曼的国家权力理论有助于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根本—基础—保障—依托”的论述逻辑关系,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的国家权力理论的“中国式”政治表述,意味着维护多领域国家安全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文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是彼此关联的,任何一种权力的缺位都会危及国家安全。同时在高度互动和密切关联的国际社会中,这些领域性的权力可能会穿越国家的边界而构成复杂的、具有联动性的安全问题。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强调了政治安全的重要性,“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⑪的定位,

体现了国家权力理论中以政治权力为结果性权力的深刻内涵。政治权力最直接代表着国家权力,它是其他权力互动的制度性结果,也是其他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结构。比如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权力)有效利用意识形态权力和军事权力互动的结果,而作为结果性权力的政治权力又反过来决定着其他权力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对以政党作为国家体制的核心组成的中国而言,凸显了党的领导是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坚强保障,从而表明了“党国一体”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②。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纳入政治安全的定位,其内涵已经超越了迈克尔·曼的相对于其他权力而言的政治权力,深化并丰富了国家权力理论。其中,意识形态权力深深地嵌入其他类型的权力之中,其他类型的权力也都存在于意识形态权力的“网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权力之于国家安全的关系,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发掘。

此外,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最新论述中,提出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③,明确将国家安全能力提上议程。国家能力是国家权力的“下位议题”,都属于国家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如何建设国家能力,保证国家“有能力”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保持稳定与安全,是多线程、赶超式现代化任务对国家能力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

三、国家安全学科化的政治学发展动因

实践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触发理论问题。综合国内外国家安全学发展的历程来看,驱动国家安全学演进的因素,既包括内生性的安全需要,安全需要的变迁改变了政治门类学科的关注点和重要性,也包括国家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自身的知识社会学生长逻辑。^④

从国际经验来说,内生需求即实践中对国家安

全的现实需要,是国家安全研究最终形成学科体系的主要推动因素;内生需求的差异,也使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研究呈现出各自的侧重点与特征。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学的创设,与二战前后美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央、面对国际秩序重大变革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帮助美国综合运用多种力量应对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制定更为有效“击败敌人”的战略与策略^⑤。而在欧洲,德国的国家安全研究随着外部安全局势的变化,与两德统一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一致,从历史反思、回避军事议题逐步转变为对国家战略利益和大国竞争等议题的关注^⑥;法国则围绕“以欧洲一体化确保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发展“以小慑大”的核威慑战略等开展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探索^⑦。

对我国而言,国家安全学在新时代的设立有其特殊的时代性——在国家“强起来”的进程中政治学大类学科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这也符合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大趋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8年颁布学科目录时,正值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追求“富起来”的阶段,经济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经济学自然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学科王”;而2021年新颁布的学科目录则反映了“强起来”的时代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成为政治学相关学科关注的核心议题。这需要学科和国家一道,共同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和问题。一方面,中国独特的政治道路、政治制度是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中国威胁论本质上是宣扬制度威胁论,大国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中国发展面临守成国家全方位战略打压的安全威胁,需要探索如何在极限施压环境下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文明和超级规模决定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有可能改变具有不平等特征的世界体系,结构性变革的道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世界政治格局的结构性和时代性决定了,国家安全已经是中国在“强起来”过程中面临的突出挑战,如何应

对那些迟滞甚至中断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需要多个学科的合力。

在时代挑战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践层面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政策安排,已系统性地整合上升为执政思想^②。而国家安全学的设立,进一步要求理论研究超越即时性的“问题—回应”式对策,为把握国家安全议题提供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支持。国家安全的“政策—思想—学科”的进阶发展,不仅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而且是中国政治学议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学术研究上,国家安全学的建立与建设也有其自身的学理生长逻辑,这与政治学的议程发展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得到恢复,其初衷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重大需求,其中,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从提出之初就是作为政治学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方向而存在,以期让学术研究“为我所用”。但是因为政治学经历了长期空档,学科恢复后需要通过大量引入西方理论来缓解“理论荒漠”,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③,现代化理论由此被引入国内;9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自由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头二十年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④这些引入的知识体系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政治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在流行的过程中影响着学科议题和价值判断,使学术研究容易沿着西方已有的路子和关注的议题去延伸,其中暗含着以西方流行理论为标准的学术指向。例如,20世纪80年代起引入的多种概念像“市民社会”及其背后的国家—社会二分法的框架被套用于中国,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往往会被动或不自觉地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心的议题转化为自己研究的“前沿议题”,以期对大洋彼岸做出回应或互动,从而学术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跟随式”“回应式”的特征。

对此,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和摸索,政治学的议程也在进行调整,比如对既有的引入话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力求从中国政治本身理解中国政治^⑤,并开始对既有的概念如“东方专制主义”等进行反思清理。而经过40余年的政治学恢复重建,中国政治学已建立了具有主体性和创新性的学术研究,在学科体系建构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国家属性和国家意志,与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政治学有鲜明区别,同时越发呈现出基于本土经验和需求的强烈问题意识。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发展问题是首要问题。中国作为具有古老文明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国家建设必然面临与西方不同的问题,而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进程中,政治学已经越发体现出学术自觉,形成了田野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和流派。这些研究不从理论预设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为搭建基于中国土壤的政治理论体系、创建原创话语进行努力。

新时代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大变局时代下,以理论体系支持中国进行现代国家建设和参与国际格局构建。这必然要求超越单纯的偏向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安全学,去构建复合型的国家安全学,这是大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已经拥有学术自立能力和学术自觉的政治学必然的研究趋向。在发展进程中,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对国家内外部的权力关系、制度安排等问题领域有更敏锐的识别,其中孕育了政治安全、国际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方面的研究议题,呼唤更具有独立性、系统性、学科化的国家安全研究。

由此,国家安全研究和本土的政治学研究一脉相承,具有强烈的实践价值取向,与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战略目标联系紧密,这使得国家安全学天然地脱胎于本土化的土壤,具有鲜明的立场,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科。但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学的问题导向性和实践性特征,也容易限于时效性

的问题解决而使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受到局限,因为虽然许多安全问题是“当下”发生的,许多研究指向也是政策导向的,其问题根源却是历史性的。对此,政治学则擅长结合历史过程,针对经验现象的演变与差异进行逻辑解释,善于将具体的经验问题进行理论化抽象,形成具有解释力的范式或理论。例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等学者关于大国兴衰的研究,从基础理论的角度为分析当前和未来的一些问题提供总体指引和全面视野。

目前,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国家安全学的4个已确定的二级学科方向,即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②中,政治学从宏观性的基础理论到中观理论均可提供基础性、指导性贡献。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宏观层面上不同的国家安全思想是塑造不同国家安全体系乃至塑造全球安全体系的根源,是一流大国的国家安全学科最顶层的理论贡献,也是政治学作为国家安全学基础的最关键之处。二战后,正是美国主导的政治学研究议程,以“现代化/发展”和“民主化/转型”为引领,实现了各个专业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③,不但提升和拓展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议程设置能力,而且以政治思潮的形态真正地影响大量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道路选择和政治变革,构建服务于其绝对安全观的“民主和平论”,为实现其政治意图、塑造有利于自身霸权扩张的国际安全环境提供极大助力。

这给我们以启示:中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和理论应该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为基础,提供基于自身经验的有效、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比如从中国的政治学界已有普遍共识的“有效治理”角度出发,尤其关注国家、政党等组织性主体如何在(后发)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发挥作用,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致

力于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维护和平、获得平等发展机遇的新路径,比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和以“六个坚持”为核心的《全球安全倡议》,其内核是通过处理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来解决政治冲突的安全问题,突破了对自身安全关注的局限性,在和平与发展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这也是中国对全球安全的理论贡献。

而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正是“有效治理”视角下政治学领域长于定义、辨析、测量的对象,尤其从比较政治研究角度出发,可以借由比较案例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等方法,提供对国家安全的治理绩效、制度体系等多个层面的研究,通过透视国家结构、内部权力分配、社会经济不均衡发展、制度不公正、制度效能低下等问题,系统性阐释产生安全困境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的政治学学科经历了四十年来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吸收和结合本土经验的再创造,已经相继出现了历史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等议程更新,提出了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与方法。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坚决维护并主动塑造有利于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国家安全学所具有的高度本土意识和中国属性也正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中议程更新的必然结果,政治实践和学术议程的双重发展推动着国家安全从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分支问题逐步升格为一个独立学科,为中国“强起来”进程中的国家安全提供自主、自觉的学理支持。

与此同时,不但国家安全学脱胎于政治学而成为一级交叉学科,原是政治学二级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纪检监察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也分别成为一级学科,和国家安全学的设立一样,这都是政治实践时代化进程中知识体系和研究议程自主化、本土化的结果。这些新兴的一级学科和政治学一道,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学门类。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

学、党史党建学等学科的设立,既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提升,同时也昭示了政治学门类化的发展趋势:一流国家需要并且能够产出一流的社会科学,产出一流的政治学,一流的政治学知识产品也只能由一流的时代强国提供。

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中国都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自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国在现代化多线程的任务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必然有其原因和道理,如果把这些原因和道理看作例外论,对于我们中国人讲就是妄自菲薄,对于外国人讲就是一叶障目^⑤。尤其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尽管美国政治学具有区别于欧洲学术的特征,但事实上美国政治学是对欧洲政治学的延伸,二者的同一性大于差异性,政治学自产生以来,欧美政治学还未曾遇到哪个国家有可以与之竞争互动的政治学^⑥,这也与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未能跳脱出欧美政治道路的框架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知识资源堪称宝贵,如何将中国经验学理化为普遍性的知识,这是包含国家安全学在内的政治学类学科的使命与担当。

四、国家安全学对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反哺

国家安全学的建立和发展内在受到政治学议程发展的影响,反过来也会推动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政治学的发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安全学有助于促进文科专业内部的深度融合及文科与理工农医的交叉融合,有利于打通政治学内部的“孤岛”现象,促进政治学本身议题、领域和方法的革新,而且使得政治学研究有着更加明确的指向性,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推动比较政治发展研究。

首先,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是在新技术革命到来的新时代条件下,面对复杂的风险挑战和重大的社会变革应运而生的。这使得国家安全学天然面向的是改革发展的复杂现实问题,要求文理工农医合力解决复杂的跨学科难题,也就必然要求促进

学科交叉融合,从而引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塑,促进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自我更新。

就政治学而言,从文理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来说,多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议题、研究方法都可能从国家安全学的发展中获得拓展,比如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交叉融合的计算政治学,就可能会有利于在全球数字治理的时代下解决全球安全和治理的相关问题,成为新的学科增长点。从促进政治学专业内部的学科融合来说,政治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互动融合也将进一步提升。既有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安全往往被分开阐释,前者被归为政治学原理或政治学理论(包括比较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研究),而后者则属于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实际上二者都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从属于一个知识体系,都是以国家权力理论为研究起点;二者还都属于同一个方法论体系,比如历史社会学或历史政治学路径,因此二者研究范畴的通融性很强。但是,相比于西方学术界,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进程中,政治学理论和国际政治学的互动明显不足,从而限制了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层次和研究水平——没有政治学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容易变成纪实性描述,停留在时政评论层面;同样,没有国际政治学的支撑,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容易变成缺少比较视野的孤芳自赏。即使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如果没有国际问题的关怀,没有区域国别知识背景,往往是概念化的空洞表达。政治学学科的不断分化也使内部不同二级学科、不同领域和议题之间形成孤岛,岛与岛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学者们对政治学的整体图景缺乏足够的把握,对政治学的一些“根本问题”(big question)和基础理论的贡献能力仍有待提高。^⑦

学术界对打通政治学学科内部“孤岛”的必要性并无异议,其关键是知识的连接点问题,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宏旨的国家安全学为此提供了连接点和研

究议程。对于国际问题学者而言,中国学者关心国际问题的原点,应该是如何服务于国内政治安全,即如何为我国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构建安全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其着眼点在“自身发展”和“国内政治优先”,而并非为了谋求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地位,这和流行的盎撒式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关系传统有着天然的差异,为理解国际安全问题提供了基于国内政治的分析视角。比如,俄乌冲突中的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威胁不但来自外部的北约东扩,也来自内部因苏联解体后“休克治疗”、权贵腐败而导致的国家能力衰弱。同样,对于政治学理论研究而言,如果没有世界秩序的视野去研究政治安全,没有共同安全意识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去关怀人民安全,政治安全也就失去了“依托”。大国的国家安全必然是世界性的,国际安全因此也具有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意义,既受到世界体系的结构影响也反过来塑造了世界格局。

其次,国家安全学提出了以服务国家(政治)安全为指向的政治学研究议程。脱胎于政治学并以政治学知识体系为研究基础的国家安全学一级交叉学科的出现,事实上给中国政治学指明了应该研究的重点问题。如前所述,因为中国政治学发展存在断档期,复建后的中国政治学具有很强的“拿来主义”成分,移植了大量的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资源、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都是外生性的,研究议程往往不是中国最需要的或者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以比较政治学为例,转型学的研究范式以及配合民主化而流行的强调个人权利的治理理论,这种研究议程总是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政治变成理论图景上的国家,反而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同样,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议程中,“去帝国主义”理论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大行其道^⑤,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是大讲特讲国际制度的重

要性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必然性,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和现行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背书。这些理论的流行所塑造的政治观念容易掩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政治的剥削和压迫本质,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国际安全。

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家安全学的设立是在构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把政治学理论研究和国际关系学带回应有的研究议程,即政治学最核心、最优先的目的就是研究安全和秩序问题,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知识而知识。以国家安全为指向的政治学研究议程,将一段时间以来公共管理化的政治学研究拉回到“治国理政”的高阶议题,并且重塑基础概念、基础理论,而这正是政治学为整个社会科学提供原创性自主知识产品的立足点。虽然有些学者已认识到政治学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回到学科的本源性问题,但其效果远不如设立一级交叉学科这么大。学科建设不只是学界的事,也是政治实践的需要,由政治实践需要所强力推动的研究议程乃至学科设置,通过重新配置学术资源,驱动研究者跳出原有的“舒适区”。

最后,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意味着国家安全学研究必须与政治发展研究结合起来,国家安全研究因而变得充实且可信,并有力地推动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但是中国政治实践的智慧结晶,也是比较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因此国家安全研究不但要置身于中国自身的语境,还必须置于比较政治研究,在“现代化”的进程和语境下进行,由此产生的国家安全研究才不至于空洞无物。同理,有了国家安全的视野,也有助于明白为什么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发展。安全和秩序是实现持续发展和基本正义的根本性前提。在比较政治发展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有长期殖民地历史,虽然民族解放了,但依然不能拥有独立的主权,事关国家安全的“主权能力”缺位^⑥,公共政策缺少自主性,只

能成为“依附型国家”，结果必然是不发展。例如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因国家安全阙如而只能服务于美国的产业政策需要，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从国家安全学的角度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具有范式革命意义。二战以来的比较政治学，从现代化研究到民主化研究，对国家安全问题视若无睹，结果是现代化和民主化非但不能有效地推动政治发展，反而出现“政治衰朽”和“无效民主”下的无效治理。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结果，应该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案例而深入研究。

五、结语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国家安全学，“总体”的实践性特征在理论上能够从国家性和政治性上得到诠释；而国家安全的本质是国家权力安全，体现了国家权力学的基本原理，国家权力正是政治学与生俱来的研究对象，甚至可以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政治学是国家安全学建设不可动摇的基础与核心^⑨。

国家安全学的诞生是政治实践发展和政治学学术议程发展双重动因下的结果。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意义在于，促使政治学回归初心——共同体的安全与秩序是政治学诞生之际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所以如前所述，政治学堪称国家学，而国家的目的是实现安全、秩序、发展和正义。但是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中，政治学的“舶来品”成分很重，结果是政治学的目的论淡化，甚至有的政治学研究反而有害于国家的安全和秩序，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带来的深刻教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安全学的提出，无论是对政治学理论还是国际问题研究，都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即找回政治学的初心和实践品格。事实上，作为交叉学科性质的国家安全学确实有助于推动中

国政治学的发展，不但能矫正政治学的研究议程，还将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打通政治学内部的“孤岛”现状，并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野中推动比较政治发展研究。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学跳出了以个人权利为本体论的西方政治学知识框架，是建设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

注释：

①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演变和表述上的系统梳理，可参见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凌胜利、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肖晞、王一民：《中国共产党百年国家安全思想发展析论》，《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1期；董春岭：《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百年演进》，《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黄大慧、胡庆：《统筹发展和安全：演进逻辑与时代价值》，《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

②随着内外部形势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主要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粮食、金融、数据和人工智能20个领域。

③胡尔贵、万婷：《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探索、问题与纾解》，《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2期。

④相关问题研究和论述可参见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唐永胜：《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创新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9月18日；李文良：《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及其未来发展》，《情报杂志》，2021年第8期；李文良：《国家安全学的内生逻辑及其学科特征》，《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梁怀新：《交叉学科门类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路径分析》，《情报杂志》，2021年第5期；毛欣娟：《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⑤唐永胜：《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创新发展》，《人民日

报》，2023年9月18日。

⑥参见肖晔：《中国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7期。

⑦王秉、史志勇、王渊洁：《复杂性时代的国家安全学新范式：构建国家安全复杂学》，《国际安全研究》，2023年第4期。

⑧参见袁鹏：《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刘跃进：《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⑨参见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

⑩余丽、王高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指导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建设研究》，《国家安全论坛》，2023年第6期。

⑪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⑫徐勇、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⑬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9页，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⑮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⑯唐永胜：《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创新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9月18日。

⑰冯维江、张宇燕：《新时代国家安全学：思想渊源、实践基础和理论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

⑱徐勇、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⑲参见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⑳参见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中文版前言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㉑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58页，学习出版社，2022年版。

㉒陈明明：《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安全：历史、战争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㉓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㉔参见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㉕于铁军：《霸权的护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

㉖卢晓：《从克制到进取：德国的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2期。

㉗于江：《大国意识与独立自主：法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

㉘江天雨：《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学理化的能力、经验与启示：以政治安全的时代性表述为例》，《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㉙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

㉚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㉛参见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㉜靳晓燕：《国家安全学，这门新兴学科怎样“学”》，《光明日报》，2022年5月24日。

㉝吕杰：《区域国别研究复兴对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意涵》，《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2月28日。

㉞陈明明：《新时代政治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1期。

㉟徐勇、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㊱王中原、郭苏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40年：历程、挑战与前景》，《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㊲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0—38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㊳江天雨：《中国国家能力建设的时间性分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4期。

㊴李丽华、曹昊哲、王赫：《国家安全学学科交叉属性研究——基于交叉测度理论》，《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5期。